

探赜孔子“君子人格”之内蕴

钟超

在中华传统文化中,“君子人格”是一个核心的理想道德典范,主要源于儒家思想,尤其是孔子的学说。《论语》中“君子”概念共出现107次,可见其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。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项深远贡献,就是通过君子人格的构建,将整个民族引向一种道德自觉的精神国度。

一、“正道直行”的人格修养

《论语·雍也》云:“人之生也直,罔之生也幸而免。”正道直行,行得正,坐得直,不偷奸耍滑,不搞阴谋诡计、权谋诈术,孔子认为这才是正人君子应当尊奉践行的人格修养之道。

孔子认为,正道直行的君子人格是天道的启示,按照天道去行人道,就是君子人格。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人、做官,当然值得人们尊敬。然而,对于具备一定社会阅历的读者而言,在领会“正道直行”这一训诫时,心中不免会有所审思:在现实经验中,坚守原则、刚正不阿的君子之行,有时反而会遭遇困境,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;反观那些讲究权变、善于逢迎的“乡愿”之人,却往往能左右逢源,广受欢迎。面对此种现实张力,个体应如何

自处?这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现实与道德困境。孔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,在《孔子家语·三恕》中,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:

伯常骞问于孔子曰:“骞固周国之贱吏也,不自以不肖,将北面以事君子。敢问正道宜行,不容于世;隐道宜行,然亦不忍。今欲身亦不穷,道亦不隐,为之有道乎?”

孔子曰:“善哉,子之问也!自丘之闻,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。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,听者无察,则道不入;奇伟不稽,则道不信。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,制无度量,则事不成;其政晓察,则民不保。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,刚折者不终,径易者则数伤,浩倔者则不亲,就利者则无不弊。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,从轻勿为先,从重勿为后,见像而

勿强,陈道而勿拂。此四者,丘之所闻也。”

孔子提出的这四条,被认为是他为弟子开出的四副良方:思想理论不能太艰深晦涩,应以简洁易懂为宜;制度建设不宜过于严苛繁复,应以宽疏合理为宜;为人处世不能过于刚直傲慢,也不要想着为一己私利偷奸耍滑;做事情不要拈轻怕重,但也不宜过于逞强,超出自身能力限度去追索。孔子对弟子的言教不是脱离实际的凌空蹈虚,而是在洞彻庙堂和江湖的运行规则之后,仍然坚守初心,不忘本来,知其不可而为之。所以,他心目中理想的君子人格,是心存正道,但不迂腐,懂得灵活变通,能够实事求是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在现实政治中实践经世致用的目标理想。

二、“自强不息”的刚健精神

自强不息的精神,是儒家文化的经典理念,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《周易·乾卦·象传》中指出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底蕴源于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一书由《易经》(六十四卦卦爻辞)与《易传》(“十翼”)共同构成。在儒家传统中,《易传》的创作与孔子密切相关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: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。”

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意思是说,君子应当像高天一样,强健而运行不息,纵使颠沛流离,也要不屈不挠、自强行健。

孔子的自强不息精神,首先体现在他对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态度上。孔子强调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。他还特别指出: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

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孔子生逢乱世,但并不苟且偷安,相反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四处奔走,哪怕失去最宝贵的性命也义无反顾。这一思想境界经孟子发扬光大,形成了一种浩然的大丈夫人格,进而成为中华文化当中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养料。后世中国,每每遇到民族危亡之际,总有一些不怕死、不惜死的英雄人物拔剑而起,挺身而出,舍生取义,救民于水火,这正是中华文明的超越性所在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: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(鲁迅: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)

孔子提倡的儒学,不是形而上的书斋学

问,而是积极用世之学。孔子说“士志于道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读书人出来做官,不是为了个人荣华富贵,而是为了天下苍生,为了匡扶正义,为了造福于民,为了这个“大道”,应当躬身入局、挺膺负责,甚至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,它蕴含着儒家经世济民、刚健有为的精神传统。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,从而塑造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入世品格。

孔子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,还体现在他坚韧不拔、奋斗不辍的人生历程中。孔子生于乱世,但他对自己的理想抱负坚持到底,并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。即使在匆忙之时、困顿之际,也始终坚定理想信念。正所谓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(《论语·里仁》),其刚健勇毅的精神可见一斑。

三、“厚德载物”的博大胸襟

《周易》载: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这是对坤卦物象的解释。与坚毅刚强的天不同,古人看到的大地是敦实、辽阔、广袤、平顺的,所以人不仅要取法于天,像天一样刚健奋发,也应当取法于地,像地一样包容万物。“德”是中华文化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,《尚书》记载:“惟德动天,无远弗届。”意思是德政可以感动上天,不管多么遥远,这种感召力都能触及。“德”的理念在中华文化中开始形成广泛影响力,是与周革殷命的历程相伴随的。

孔子倾心周礼,对周代文明赞叹有加,自然尊奉周人之德。《论语》中提到“德”的地

方近40次。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提高道德修养,只有德行提高,才能适合担任更高级别的官职,否则就可能面临“德不配位,必有余殃”的局面。孔子多次提到君子之德,比如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,必偃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此处强调的是君子(此处更多指的是地位较高的人)应当涵养好的德行,成为社会的表率。在孔子看来,君子应当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,因为他们承担着引领风气、净化风俗、淳化道德的责任。

厚德载物,不仅是一种个人层面的道德修养品质,也延伸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交往

原则,不仅在孔子时代为当时的人们所尊崇,也为今天中国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丰厚的借鉴。《论语·季氏》中指出:“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《中庸》也指出:“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……修身则道立,尊贤则不惑,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,敬大臣则不眩,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,子庶民则百姓劝,来百工则财用足,柔远人则四方归之,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”这些凸显了中国古人对理想生活和政治秩序的期待和向往。通过修身立德、克明俊德,实现家族的和睦、民族的和谐、邦国的和平,最终实现百姓安居乐业、四海升平的和谐局面。

四、“有耻且格”的荣辱观念

荣辱观是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,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孔子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这句话反映了孔子德政的治理思想。与法家崇尚刑罚的治国理念不同,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认为,单纯依靠法令条文等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,只能算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方式。孔子更认同的方式是,通过建立一套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,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遵行社会运行的法则,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就要树立一套荣辱观念作为价值标准,使老百姓心悦诚服、知

所趋赴。

荣辱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体系。无论是一个人,还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,越是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、悠久的文明底蕴,就越是注重道德评价。荣辱的道德评价对于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约束力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云:“孔子成《春秋》,而乱臣贼子惧。”那些在乱世中弑君、弑父的乱臣贼子,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现实的政治权力和荣华富贵,但他们惧怕孔子,何也?因为孔子在编订鲁国编年史《春秋》时,于“微言”之中彰显褒贬,这些乱臣贼子也怕被写进悠悠青史,遭到舆论和后世的唾骂,遗臭万年,所以他们心有畏

惧。这显示了荣辱评价对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。

《管子·牧民》中说:“国有四维,一维绝则倾,二维绝则危,三维绝则覆,四维绝则灭。倾可正也,危可安也,覆可起也,灭不可复错也。何谓四维?一曰礼,二曰义,三曰廉,四曰耻。”“四维”观念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,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,也激励着中国人行己有耻、向上向善。正因如此,“礼义廉耻”作为支撑国家命运的“四维”,其价值早已超越具体时代,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。

据孔子研究院公众号